

新时期文学论评

张
炯

新时期文学论评

张
炯

1987.5.18

1987.5.18

新时期文学论评

张 炯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0.125印张 2插页 240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90

书号：10368·165 定价：1.63元

前 记

福建人民出版社约我编一本近年的文学评论集，责任编辑管权同志为此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我实在非常感谢。这是继《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和《张炯文学评论选》出版后我的第三本论文集，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所以，题为《新时期文学论评》。全书分五辑，大略上第一辑属于新时期文学的综合性评论；第二辑是对中短篇小说的评论，有的涉及作家的创作道路；第三辑是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包括对长篇创作中的错误倾向的批评；第四辑则辑录有关近年创作问题的文艺短论；第五辑汇集几篇较长的学术性论文，其中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的文章因论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比较重要，虽未能展开，也收在这一辑里。倘若上述文字对于读者了解我国新时期文学有所助益，我将会感到十分高兴。当然，不妥之处，更希望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福建是我的故乡。我曾在八闽土地上生活过、学习过和战斗过。那美丽如画的三都澳，那商埠繁华、人物荟萃的福州城，那山高林密、云雾缭绕的仙霞岭、戴云山，那碧水长流、风帆如织的闽江、九龙江，那惊涛拍岸、石崖峭立的海疆和岛屿，都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每当我在北国临窗瞩望南天，总是浮想联翩，情怀激荡。半个世纪来，福建人民为摆脱黑暗、寻求光明的革命斗争中，有多少风云历历在目，有多少烈士音容宛在。我是幸存者。在当年秘密传递地下报刊的行列中，在山林游击队的篝火旁，在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跨海作战的雄壮队伍里，作为一个少年，我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将来会成为文学评论工作者。然而在社会

主义年代，正如成千上万昨天的战士，被党和人民培养成各种各样的工作者一样，我竟然走上了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岗位。惭愧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努力不够，迄今还成绩很少。这个集子权当是我向党和人民，向八闽父老所作的粗浅汇报，并以此鞭策自己，求得今后能有更好的进步。

作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于北京崇文门

目 录

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特色	1
正确评价近年来的文学创作	17
就当代文学问题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	24
一九八一年的中国文学	31
新时期文学繁荣的原因及其启示	58
从莎菲到杜晚香	69
——论丁玲同志的创作	
人民道德精神力量的礼赞	90
——评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	
一串献给英雄和新人的花环	99
点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火焰	103
——漫评《昆仑》几部中篇小说的新人形象	
关于《绿化树》评价的思考	118
别具格调的“改革”篇	125
——读《猎神，走出山谷》	
崩塌吧！灰色的王国	130
我爱美的谷穗	134

——读绿原《西德拾穗录》	
序曾毓秋同志的《三月清明》	139
《森林，人在深邃幽远中》序	144
《幼林里的墓碑》序	149
 英雄人民和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	 153
——读长篇小说《东方》	
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72
读《在严寒的日子里》	185
评《人啊，人！》的思想和艺术倾向	195
——兼论“自我表现”与反映时代	
 关于问题小说	 208
短篇小说三议	215
从生活出发 揭示人物的心灵美	220
也谈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派”	223
谈改革与文艺	230
作家之路	237
——答赵福东同志	
 论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	 242
论文艺创作表现人性的问题	264
在战斗中前进	279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关于新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89

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特色

新时期六年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继续，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的复兴，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为十年内乱岁月所不能比，从许多领域和方面看，也超过建国初的十七年。这就使得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六十年来历史上，占有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地位。茅盾逝世前曾说：

“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地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①这个论断是符合事实的。而三十多年的新中国文学中，六年新时期文学尤占有突出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在它之前，中国出现了十年的文学浩劫，其中有五年，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甚至全然没有新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六年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获得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的，它必然带有新的历史特色，也有可能沿着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正确的道路前进。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说，新时期六年的文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六十年来我国新文学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而且还是文学在反映现实题材，描写人物典型，开拓形式和风格

①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序》。

等方面，道路最为宽广的时期。它的繁荣兴旺的景象，在世界文坛上也是罕见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虽然为时短暂，它在我国文学发展方面的彪炳功绩，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示其不可泯灭的意义。有些作家在这时期，也许将标志自己一生所攀达的高峰。有些作家从这时期起步，将可能踏上未来伟大作家的梯阶。这是个新旧交错的时期，也是除旧布新的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和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都在六年文学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的后人在回顾这时期文学时，将会说：

这是从长期左倾所带来的思想僵化走向思想解放的六年。

这是破除个人崇拜和打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使人民民主得到发扬，艺术中人为的“禁区”被不断突破的六年。

这也是文学从历史迷误里走出，阔步迈向未来光辉大道的六年。

六年，在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后的这六年，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上，确实占有承前启后的十分重要的地位。六年文学的历史重要性，也跟它的承前启后，跟它本身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分不开。这种转变构成了六年新时期文学的鲜明历史特色。探讨这种特色及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应该说，对于继续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将不会是无益的。

新时期虽然肇始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但六年文学的发端和序幕，应该追溯到“四·五”人民革命运动中涌现的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歌。

一九七六年初，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举国上下，万分悲恸。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欣喜欲狂，弹冠相庆，加紧篡党窃国的阴谋活动，甚至限制和禁止人民悼念敬爱的总

理。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对于社会主义成果将要丧失殆尽的强烈担心，对于“四人帮”一伙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强烈痛恨，一起汇成广大群众心中的怒火，象熔岩在地底运行，丙辰清明节终于冲出地面，爆发了。在北京，数百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抬着无数洁白的花圈，走向天安门广场，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以歌文为武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怒斥罪恶的“四人帮”。全国各大中城市也出现同样愤激的人流。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自觉地不顾一切地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创举，也是现代文艺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壮观的一页。全世界都为之震动、惊诧，为之肃然起敬。

当时，这场运动被“四人帮”一伙残酷地镇压了。然而，棍棒和锁链无法扑灭和禁锢人们心灵上的诗的火焰。天安门革命诗抄不胫而走，迅速播及全国，召唤人们为保卫社会主义而战斗。

“四人帮”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在人民面前彻底暴露，这就为他们的覆亡敲响了丧钟。

不了解以天安门革命诗歌为光荣标志的“四·五”人民革命运动，就很难理解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尽管，天安门革命诗歌大多未脱急就章的仓促，难求艺术的精美，并且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但这些诗篇中跳腾的火焰、滚烫的激情所表达的思想，却深深扎根于十年动乱岁月苦难的中国土地，喷发于人民向往光明未来的心坎。亿万群众对历史的巨大责任感，他们为保卫和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以及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历程中光明与黑暗必然要无情搏斗的严峻而清醒的认识，都凝结于雪片般的诗篇中，给予新时期全面复苏的我国文学以深远的影响。正是天安门革命诗歌所体现的党和人民群众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新时期广大作家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新时

期六年文学主导的思想和艺术倾向。

新时期六年文学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二年的初步复苏阶段和后四年的欣欣向荣阶段。这两个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文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前阶段，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在各项工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障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拨乱反正，才不仅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也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但是，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这六年文学又毕竟存在着若干鲜明的共同历史特色，概括起来说就是：

第一，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两大历史潮流。五四以来，鲁迅和郭沫若便是这两大潮流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原则，也是历史地发展的。从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作中，便日益成为文学的主潮。由于它要求在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矛盾对立的现实关系中，努力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因而，它也就实际上包含了革命浪漫主义因素。许多革命作家在创作中都不仅描写了生活是怎样的，还尽可能描写了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从茅盾的《子夜》、丁玲的《水》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的创作，都可以得到证明。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建国后继续得到发展，结出了更多的果实。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正式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本来也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他历来主张“革命的文艺，

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但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倾背景，加上五十年代中期起，我国文艺界先后对所谓“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开展的错误批判，不能不助长“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①这种早为恩格斯所反对的倾向。及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文坛的十年，文学更走向“瞒和骗”的绝境。文学一旦脱离生活真实，也必然脱离群众。“四人帮”的文学侍从们呕心沥血地炮制的种种文学赝品，尽管自吹自擂，鼓噪一时，随着历史前进，终被广大读者所唾弃。而天安门革命诗歌直面严峻人生，于沉沉黑夜中呼唤曙光必将升起的真实力量，又重新验证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

这一切记忆犹新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能不给我们作家以深刻的启示。因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强调从生活出发，重申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确认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广阔，便成为许多作家、艺术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不可阻遏的强大潮流。一九七七年岁末，文学的轻骑——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便以焕然的新姿驰骋于文坛。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短篇小说创作走向一个新的起点，为以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正确处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创造了宝贵的经验。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描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在一九七八年春、夏的出现，不仅进一步打开了文学中知识分子题材的“禁区”，也为报告文学本身沿着革命现实主义方向拓出更加宽广的道路。以缅怀革命先烈和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题材的挽悼散文，情真意挚，有如素馨的鲜花大批出现，尤其是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所有这些

① 《致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5页。

作品，加上当时产生的优秀剧作《报童》、《丹心谱》、《于无声处》等，便构成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的最初浪潮。而其理论的最初表现，在诗歌要抒“真情”、讲“真话”，报告文学要描写真人真事，小说、戏剧、电影等都相继弃绝“主题先行”，面向生活真实的一系列主张和呼吁中，都不难看到清晰的轨迹。随后，理论批评方面在关于“伤痕文学”和围绕所谓“歌德与缺德”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痛定思痛，肯定十年内乱的创伤理应在文学中得到真实的反映，肯定我们的文学既要歌颂光明面，也要揭露阴暗面。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同志的报告和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同志的重要讲话，都指明问题在于应从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去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周扬同志指出，革命作家必须“善于发现一切新生事物和先进力量，也勇于揭露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①。胡耀邦同志更号召作家，“要进入到更深刻的更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里面去，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同阶级的关系中去，进入到社会发展的各种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中去，进入到各种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分析它，解剖它，发掘不同的人们的灵魂。”^②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重要意见，都给作家以思想的武装，从而，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坚实和宽广的道路。

新时期六年文学中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汲取以往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和深化，不断创造和积累新的经验，并从外国文学中借鉴有益的养分。在众多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作家们不断向当代生活和历史生活的纵深掘进。我们的文学还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以极大的革命义愤，直言无讳地去揭露十年内乱所造成的社会和心灵的种种创伤，也从

①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36页。

②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235页。

来不曾象现在这样，清醒而冷静地从历史的高度，去对社会主义三十年、甚至民主革命年代的生活风涛作重新的思考和认识，把被扭曲或颠倒的历史图画重新恢复它的本来面貌；更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燃烧着炽热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宏伟理想，去勇敢地揭示现实生活的重大矛盾和斗争，去讴歌光明面，鞭笞黑暗面。而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剖析现实，歌颂先进事物或是针砭社会弊病，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比之过去更重视真情实感，更注意写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影响中的各种人物、包括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并努力反映由于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必然产生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而且由于作家从现实生活出发，文学所表现的题材、所描写的人物，也必然日益广阔。这样，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时期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学画卷，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从战争到和平，从光明到黑暗，从重大历史事件，到个人内心的曲折波澜，都被作家剪裁结构，点墨敷彩。而这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从英雄到小丑，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普通人，也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而且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形神毕肖的形象和许多富于八十年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造型，首次出现，以其夺目的光彩，吸引广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真是整个大千世界，浩荡乾坤，都从不曾象这六年，被文学如此广泛地摄取和描绘。各种文学体裁和样式，皆根据自己的特点，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对象。由于多视角、多层次地摄取生活和人物，文学的银幕上便出现了空前复杂、色彩斑斓而又富于立体感的艺术图象。社会主义四化的宏伟进军，十年内乱的沉痛伤痕，民主革命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历史人物威武雄壮的风云搏斗，都仿佛编年史般地 toward 读者展示它们的多姿和丰彩。读这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象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以及许多描写十年动乱和新时期生活变革的优秀短篇，读者都会感到其中的艺术图画，仿佛象生活本身一样率真，有着深刻的现实认识的价值，但又让人感到鼓舞，感到生活的信心和前进的力量。

确实，象这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在富于时代特征的典型的社会关系的展开中，去真实地描写乔光朴、刘毛妹、陆文婷、李铜钟、张思远、梁三喜、赵蒙生、解净、刘思佳这样的英雄人物、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在过去新中国文学中人们就很难读到。这些典型人物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是任何现成的理论概念可以演绎，而象根须离不开泥土，与不同时期的历史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物也没有被拔高、被净化或神化。他们是英雄、是新人，但又是普通人，有普通人这样那样的弱点，甚至也会犯错误，也有人的许多生活需求和全部复杂心理、丰富感情。尽管他们是理想的人物，却不是没有生活血肉的干瘪化身。在过去，人们也不可能期待文学会出现《报春花》中的白洁这种出身不好的模范人物；《内奸》中的田老板那样富于正义感的商人；《星星草》中的曾国藩、《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那种未加漫画化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至于象“红色姑娘”谢惠敏、心灵被扭曲的少年宋宝琦、“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那样的典型形象，象《芙蓉镇》中的“豆腐西施”胡玉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天云山传奇》中的女干部宋薇那样令人心酸的命运悲喜剧，其描写的真实和深刻，也是过去新中国文学所罕有的。人物形象的丰满，富于立体感和深度，跟心理的细腻刻画为加强分不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包括意识流的描写、象征和抽象手法的适当运用，是有助于更为真实地去刻画人们复杂微妙的丰富精神世界的。象王蒙、茹志鹃等许多作家在这方面的可贵尝试和探索，应当说，正有利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

当然，革命现实主义并非这时期文学的一切。实际创作中还有革命浪漫主义和“两结合”的作品，以及只是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的作品。但应该承认，正是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发扬和深化，才使我们的文学实现了如下的历史性转变：与“瞒和骗”的绝境彻底决裂，从虚幻的云端回到真实的地面，从“造神”或“画鬼”的没有生命的文学，变成生机勃勃的写人的文学，从而使六年文学主流与现实紧密拥抱中，获得自己强烈的艺术力量。

第二，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紧密的联系。

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①。列宁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写作事业应该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今天，党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是一致的。党的利益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紧密联系，既表现人民的理想、愿望和情绪，又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这本是我国革命文学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曾要求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而创作、而利用，其实质也在强调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但与党和人民利益保持密切联系的问题，在我国革命文艺史上并非任何时期都解决得很好。例如，从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由于实际工作中左倾错误越演越烈，给党和人民的利益、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当时我们的文学却对此几乎毫无反映。个别的敢于“为民请命”，敢为人民“鼓与呼”的文学，甚至被斥为“反党文学”。文学领域发生的这种悖谬情况，表面上似在维护“党的利益”，实际上既背离人民利益，也背离党的利益。至于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

^① 蔡特金：《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服务”的幌子，炮制包括“阴谋文艺”在内的种种“瞒和骗”的作品，与党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就更不必说了。

这一切不能不唤起具有严肃责任感的革命作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深思。而“四·五”人民革命运动和天安门革命诗歌的历史遭遇，却告诉人们，忠于党和忠于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新时期六年中，大多数作家都认识到，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表达人民的心声和理想，这正是党所要求的。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贺词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段话，透彻地阐明了我们党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基本看法，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更是巨大的鞭策和鼓舞。

粉碎“四人帮”后，文学中最早活跃的是诗歌。丙辰清明被压制的人民心底的诗情，随着十月胜利的锣鼓和鞭炮声，再次象山般喷发，化为庆祝人民胜利的欢歌和悼念革命先烈的悲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便是当时这方面脍炙人口的诗章。诗，弹响自己的琴弦，也拨动广大人民的心弦。诗朗诵风靡一时。首都体育馆的万人朗诵诗会，台上台下热泪盈眶，歆歆与共，可谓盛况空前。新时期文学的这种最初的景象，便有力地说明，它跟党、跟人民的关系，比之噩梦般十年文化凋零的时期，已有何等根本的不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与党和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要求。至于后来不久党中央提出